

BAIHUA
PROSE SERIES

主 编 徐柏容 郑法清

BI 散文书系
百花

苏

轼散文选集

苏
轼
散
文

97011



百花散文书系

主编 徐柏容 郑法清

苏 轼散文选集

崔承运 选注

百花文艺出版社

[津]新登字(90)002号

苏轼散文选集

崔承运 选注

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天津市张自忠路189号)

天津新华印刷二厂印刷 新华书店天津发行所发行

开本 850×1092毫米 1/32 印张 9 1/8 插页 4 字数 185000

1994年12月第1版 1995年8月第2次印刷

印数 5001—15000

ISBN 7—5360—1762—1/I·1569

定价:9.50元

编辑例言

中国古代散文，源远流长，根深叶茂。它同诗歌一样，是中国古代文学最重要、最有特色的文体形式之一，也是人类文明史上一座璀璨宏丽的文化宝库。为了弘扬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继承古代散文的优良传统，从而促进当代散文创作的繁荣和提高，并供广大读者借鉴欣赏，特编辑出版这套“中国古代散文丛书”，作为“百花散文书系”的一个组成部分。

散文文体范围，代有嬗变，古今不同。本丛书所选，皆以文学性散文为主。入选作家，上始于先秦，下迄于清末。各家作品均单独成册。各书篇目排次，原则上以写作时间先后为序，以便读者了解作者散文创作之发展与演变。

为了使读者全面了解入选的作家与作品，每书均有万字左右的序言，除简介作者生平、文学活动概况及时代与文学背景外，着重结合选入作品，评述其散文创作的艺术特色和创作发展历程以及对后世散文创作的影响等，作为阅读、欣赏、评价具体文章并进而研究作者及其散文的初阶。

为适应不同文化程度读者的需要，选入的各篇文章之

14.5.17
后,一律附加简明题解和注释,简解题旨、背景,疏释较难理解的语词、典故、职官、器物及地名、引文等。

我们希望这套丛书能够编得有自己的特色,与一般选本有所不同,能更适应广大读者的需要。我们将为此而努力,也希望能得到专家学者和广大读者的帮助。

百花文艺出版社

内 容 提 要

苏轼是唐宋散文八大家之一，他以扎实的功力和奔放的才情为散文创作开拓了新天地，对后世有极大的影响。他的传记文以生动的细节描写使人物跃然纸上；他的记叙体散文，熔议论、描写和抒情于一炉，因物赋形，汪洋恣肆；他的写景游记，即地兴感，借景抒情，借景寓理，达到诗情画意和理趣的和谐统一；他的书札、题记，随笔挥洒，不假雕饰，使人洞见肺腑……，本书选取苏轼散文中艺术价值最高的部分以飨读者。读者定会从中获取无穷的审美享受，并提高自身艺术鉴赏力。

目 录

苏轼和他的散文	崔承运(1)
刑赏忠厚之至论	(20)
上梅直讲书	(24)
滄颢堆赋并叙	(28)
屈原庙赋	(31)
江行唱和集叙	(35)
留侯论	(37)
喜雨亭记	(41)
凌虚台记	(44)
亡妻王氏墓志铭	(47)
书戴嵩画牛	(50)
跋文与可墨竹	(52)
墨宝堂记	(54)
祭欧阳文忠公文	(57)
墨妙亭记	(60)
钱塘勤上人诗集叙	(63)
盖公堂记	(66)

后杞菊赋并序	(70)
超然台记	(73)
李氏山房藏书记	(77)
李太白碑阴记	(81)
徐州莲花漏铭并叙	(84)
放鹤亭记	(86)
日喻	(89)
乌说	(92)
梁贾说	(94)
梁工说	(97)
灵壁张氏园亭记	(100)
文与可画筧筍谷偃竹记	(104)
书黄子思诗集后	(108)
文与可飞白赞	(111)
方山子传	(113)
答毕仲举书	(116)
答言上人	(120)
答秦太虚书	(122)
秦太虚题名记并题名	(127)
书蒲永昇画后	(130)
三槐堂铭	(133)
书游垂虹亭	(137)
书渊明饮酒诗后	(139)
书临皋亭	(141)
临皋闲题	(142)
雪堂记	(144)

游兰溪·····	(152)
前怪石供·····	(154)
后怪石供·····	(157)
前赤壁赋·····	(159)
后赤壁赋·····	(165)
遗爱亭记代巢元修·····	(168)
书刘庭式事·····	(170)
书陈怀立传神·····	(173)
与李公择·····	(176)
记承天寺夜游·····	(178)
记游定惠院·····	(180)
赠别王文甫·····	(183)
黄州安国寺记·····	(185)
自记庐山诗·····	(188)
石钟山记·····	(191)
别石塔·····	(195)
书吴道子画后·····	(197)
韩幹画马赞·····	(199)
王安石赠太傅·····	(201)
范文正公文集叙·····	(204)
答毛滂书·····	(209)
秋阳赋·····	(211)
六一泉铭并序·····	(216)
医者以意用药·····	(219)
书若逵所书经后·····	(221)
潮州韩文公庙碑·····	(223)

黠鼠赋·····	(229)
北海十二石记·····	(232)
雪浪斋铭并引·····	(234)
定州辞诸庙文·····	(236)
记游松风亭·····	(237)
游白水书付过·····	(239)
与参寥子·····	(241)
题合江楼·····	(243)
书《归去来辞》赠契顺·····	(245)
书《东皋子传》后·····	(247)
书《孟德传》后·····	(250)
菜羹赋·····	(252)
飓风赋·····	(256)
桄榔庵铭并叙·····	(261)
试笔自书·····	(264)
书海南风土·····	(266)
记岭南竹·····	(268)
与程天侔·····	(269)
儋耳夜书·····	(271)
又答王庠书·····	(273)
书柳子厚《牛赋》后·····	(275)
答丁连州朝奉启·····	(277)
答谢民师推官书·····	(279)
书舟中作字·····	(283)

苏轼和他的散文

崔承运

宋仁宗庆历三年(1043),一个年仅六周岁、刚入乡校的儿童,从乡先生那里窥见了当时的名士、人称徂徕先生的石介(守道)写的《庆历圣德诗》,不仅过目成诵使先生称奇,更可奇者,是他向先生询问诗中所颂韩琦、富弼、范仲淹、欧阳修等人之事。当时朝中守旧派大臣吕夷简、夏竦罢官,改革派人物韩琦、富弼等上台,是朝廷中的一场政治斗争。先生见一个总角童子询问如此重大事情,就漫不经心地回答说:“童子何用知之。”不料这儿童竟强硬地反问道:“此天人耶,则不敢知;若亦人耳,何为其不可?”如此义正词严的反问,把先生惊呆了。这个口出奇言的童子,正是后来名满天下的大诗人、大文豪苏轼。

苏轼自幼接受母亲的教诲,立志“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自觉以儒家代表人物为典范,学习他们勇于用世的精神和“独立不倚”、“刚正不阿”、“危言危行”、“犯颜敢谏”的德操与名节;又在父亲苏洵的熏陶下,文章洗尽五代以来绮靡柔弱的文风,写得雄奇壮阔,新颖实用。超乎寻常的天赋和才气,强烈的历史责任感,纯真刚正、放言无忌的性格,

既使他成了轰轰烈烈、享誉当世的名士，又注定了他坎坷不平、灾祸迭出的一生。

—

苏轼，字子瞻，又字和仲，自号东坡居士。他于宋仁宗在位的第十五年，即景祐三年（1037）生于四川眉山县纱谷行私第；宋徽宗即位的第二年，即建中靖国元年（1101）逝世于常州。这段时间，表面看来，是宋朝比较“承平”的时期，但却是宋王朝积贫积弱的局面逐渐形成、社会危机急剧发展的年代。自宋真宗景德元年（1004）与辽订立“澶渊之盟”以来，每年向辽与西夏输岁币银及绢匹以百万计。腐败无能却又以天朝自居的宋室君臣，无力抗争却说什么不屑与“犬豕豺狼相较”，纳银进贡是“大富家舍施乞儿”。宋室的苟且偷安，助长了辽、夏奴隶主的掠夺野心，弄得边尘不静，百姓疲惫，国力空虚，宋王朝呈现风雨飘摇之势。仁宗当朝的庆历年间，一批有识之士提出了“庆历新政”，要求实行政治改革。少年苏轼对新派人物十分崇敬，特别将欧阳修、范仲淹引为师表，自觉接受其政治主张和文学影响，所以，一入世便成为立志革新的青年政治家和文学改革家。嘉祐二年（1057），苏轼试于礼部，作《刑赏忠厚之至论》，主考官欧阳修、参评官梅尧臣，以为它脱尽五代、宋初的浮艳艰涩之风，十分赏识。欧阳修曾惊喜地说：“读轼书不觉汗出，快哉！老夫当避此人，放出一头地。”果如欧阳修所言，在应制科时所写“霆轰风飞，震伏天下”的二十五篇策论中，既显露出“奋厉有当世志”的政治家气度，又展示出论辩滔滔、豪健清雄的文风，从此名震四方，成为宋代文坛上的一颗巨星。

如果说《刑赏忠厚之至论》是他散文创作之起点的话，那么，嘉祐四年与其弟苏辙陪同父亲苏洵进京时，一路所写《南行集》里的部分作品，便是他一生近三千首诗歌的发轫之作。这年九月，“三苏”父子由眉山登舟，沿泝江入长江，穿越三峡，顺流而下，历时三个月，年底到达荆州（今湖北江陵）。一路上，父子三人游览了大江两岸的名胜古迹，观赏了巴蜀湘鄂的壮丽河山，凭吊了古代著名诗人的遗踪，体察了沿江一带的风土民情，大有“道路半年行不到，江山万里看无穷”（陆游《水亭有怀》）的气概。他们兴致满怀，吟诗撰文，共得百篇，合成一集，题名《南行集》，其中苏轼诗四十首。那些准确地捕捉住江山神韵、生动地描绘出三峡风光的诗篇，第一次显示了年轻诗人的出众才华。

在苏轼进入仕途的最初十年，可以说是他春风得意、踌躇满志的时代。这期间他曾授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府节度判官厅事，大理寺丞，殿中寺除直史馆等职。但到宋神宗赵顼继位，任用王安石大刀阔斧进行变法的时候，苏轼因不同意王安石的激进作法而遭到冷落。于是他请求外调，先任杭州通判，后任密州、徐州、湖州知州，先后共七年。这期间，王安石厉行新法，取得了一些成效，也带来了一些弊端。熙宁九年（1076），在变法派内部斗争与保守派攻击下，王安石第二次自请罢相，一些投机变法的分子置国家大事于不顾，结党营私，倾轧报复。而敢于“危言危行”、“忘躯犯颜”的苏轼竟成了他们政治倾轧的牺牲品。元丰二年（1079），御史中丞李定，御史舒亶、何正臣等，专从苏轼诗中寻章摘句，罗织罪证，以“指斥乘舆”、“讪谤朝廷”罪将苏轼追摄入狱，这便是历史上有名的文字狱“乌台诗案”。罪名赫赫，一时间亲朋震

恐，苏轼自己也感到性命难保，在给苏辙的诀别诗中写道：“是处青山可埋骨，他年夜雨独伤神。”所幸神宗无意杀他，加之亲故营救，三个月后结案出狱，贬为黄州团练副使。

苏轼至黄后，先居僧寺定惠院，与和尚起伙就食，后于长江边临皋亭定居。次年又由老友马正卿向黄州府求得城东旧营地一块，躬耕田亩，“与田父野老相从溪谷间”，并在市民、官绅中交了不少新朋友。特别是，所居对岸武昌、樊口，山水佳胜，有蜀人王文甫兄弟及潘生相与往来，十分亲热，每造访遇风涛阻隔，不能即归，就滞留数日，饮酒畅谈，十分快活。居黄四年，虽旷达自适，但不忘现实，除撰写《易传》、《论语说》等学术著作外，还创作了一大批关心人民与国家的作品。单就散文而言，达到了一生创作的最高峰，脍炙人口的前、后《赤壁赋》，就是这时期的代表作。

元丰七年(1084)三月改贬汝州。他先南下九江，游览庐山，之后北上，经过金陵时，拜访了罢相闲居的王安石，于安石私第居住一个月，二人悠游山水，谈心和诗，十分欢洽。他们二人同出欧阳修门下，同样富有才识和远大抱负，又同在官场倾轧中被排挤出朝廷，这使他们同病相怜，感情趋于和解。原来就一直保持着的私交，这时更加深厚了。

元丰八年(1085)神宗病故，年仅十岁的哲宗赵煦继位，其祖母高太后垂帘听政。她一手推翻新法，起用保守派人物司马光、吕公著等人。苏轼被作为旧党起用为登州太守，旋诏回朝，由起居舍人迁中书舍人，又迁翰林学士知制诰。旧党虽然给他连升三次，他却对司马光等不问利害全盘废除新法的作法不能苟同，尖锐地提出了反对意见。在朝四年，深为旧党腐朽官僚所忌恨。司马光死后，旧党分裂，人事矛

盾加剧，苏轼因直言敢谏、刚正不阿，在朝廷政治斗争中多次横遭构陷，于是请求补外。元祐四年（1089）出知杭州。元祐六年二月，以翰林学士承旨召还京都，但由于受旧党人士贾易、赵君锡的排斥，不愿久居京城，一连七上封章，乞除一郡，获准除知颍州。在颍不到半年，又改知定州。其间，他辗转迁徙，“团团如磨牛”。

元祐八年（1093）九月，高太后去世，哲宗亲政。他一收回大权便改弦更张，砸烂了他祖母的旧班底，再次实行变法，起用新派人物。然而，改革已经有名无实，一批政治投机分子章惇、吕惠卿、曾布、蔡京等人，以所谓新党面目出现，打起绍述熙、丰的旗号，恣意报复元祐旧臣。苏轼本来屡受元祐旧党的疑忌和排挤，这时却被当做旧党要员加以打击。绍圣元年（1094）四月，他被撤掉了端明殿学士、翰林侍读学士的官衔后，一月之内连贬三次，最后贬为建昌军司马惠州（广东惠县）安置。那些热衷于党争的官僚集团，对苏轼一再迫害仍不解气，于是在绍圣四年（1097）四月再把他贬为琼州别驾昌化军安置。苏轼只好告别家人，与幼子苏过负担过海，来到海南黎族聚居的荒蛮之地儋耳，在桄榔林中筑屋存身，过起了“食芋饮水，著书为乐”的谪居生活。直至元符三年（1100）徽宗继位，宽宥元祐旧臣，苏轼才得内迁。七年岭外的流放生活没有把他压垮，不料在北归途中染病于常州。建中靖国元年（1101）七月二十八日逝世于常州孙氏宅中。北宋文坛上的一颗巨星溘然陨落了。

二

文学作品是社会生活在作家头脑中反映的产物，作家

的创作道路不能不制约于生活道路的发展变化。苏轼经历了北宋仁、英、神、哲、徽五个帝王的时代。在此期间，社会危机不断加剧，政局反复多变，朝中党争此起彼伏。苏轼因秉性刚直，放言无惮而成了腐败官僚们互相倾轧的牺牲品，致使他政治上成败荣辱大起大落。两次在朝、两次外任、两次贬官的坎坷生活，使他的思想情感也几度发生重大变化，其文学创作也明显地呈现出阶段性。嘉祐、治平间，初入仕途，苏轼以青年政治家面貌出现。由于在入世之前早已打好坚实的文学根底，因而一开始便有横空出世之势。这期间的文学成就主要体现于散文创作上，《进策》二十五篇、《思治论》等，论辩滔滔、汪洋恣肆的才气，风节凛然、豪迈进取的政治改革家气派，一时轰动朝野。

两次在朝任职，是他创作的歉收期。激烈动荡的宫廷斗争，永无休止的繁忙案牍，占去他的大部分精力，使他难以致力于文学创作，名篇佳制寥寥无几。两次外任，是他文学创作的发展阶段。自请外任，是想摆脱险恶的政治旋涡，在基层实践自己的政治主张，以便实现自己“胸中万卷，致君尧舜”的宏伟理想和建功立业、经世济时的远大抱负。所以在思想情绪上尽管时时流露出朝中党争带给他的抑郁不快，但总的精神面貌是超迈进取，积极热情的。他每到一地都深入下层，了解民隐民情，熟悉人民的生产、生活状况。对百姓，征询疾苦，因法便民；对朝廷，则直言正议，指陈得失，提出自己的政见。在杭州任上，曾亲自检查湖洲堤岸，巡视富阳、新城、于潜等县。知密州时，一入境便发现官吏们隐瞒蝗旱灾情，百姓苦不堪言，于是立奏朝廷，请求减免赋税，组织百姓生产救灾，自己带头以杞菊为粮，自救度荒。知徐州

时，黄河决堤为患，他“庐于城上，过家不入”，指挥军民冒雨抢修堤坝，鏖战七十余日，保住了徐州。他不仅关心那里的农业生产，而且组织开发过白土镇煤矿。对人民生活、生活的深入了解，给他的创作带来了一股新鲜气息，使他有可能写出一批反映民情民风和歌颂祖国大好河山的诗文。元祐年间第二次外任时，在杭州以工代赈，开浚西湖，筑成长堤，治堤种荷，夹岸植柳，清除了污染，美化了杭州，同时也写下了一大批描绘杭州美景的著名篇章。两次外任丰富了社会阅历，开扩了创作视野，扩大了创作题材，这不仅使他在诗词领域获得巨大成就，而且在散文创作方面也硕果累累，除一大批政论、史论之外，还有一大批形象生动、文采斐然、给人以哲理性启迪的记叙文和杂文，如《喜雨亭记》、《凌虚台记》、《超然台记》、《放鹤亭记》等传诵千古的名篇。

“乌台诗案”是苏轼生活与创作道路上的一块界石。这次几乎致他于死地的文字狱，对他是一次沉重的政治打击，使他的社会观念、人生态度、思想情感以及创作风格等都发生了巨大变化。从此开始的长达十余年的贬谪生活，使他经历了得失骤变的政治沧桑，饱尝了荣辱无常的人生苦涩。这不仅没有使他意志消沉，相反，却使他的个性与才学在同现实生活的碰撞中，放射出更加灿烂的光华。精神世界的进一步丰富，推动他的文学创作走向了顶峰，就散文来说，自觉进行真正意义上的文学创作，正是从这里开始的。

沿着苏轼的生活轨迹尽管可以为他划分出若干创作阶段，但就其艺术风格而言，各阶段的创作都体现了多样性的统一。为此我们不做条分缕析的解剖，仅从其创作心态与艺术表现类型来看，大体分为两种：任职时期主要表现为“对